

胡适研究

HUSHI YANJIU

台湾／李敖著

李敖作品

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。

李氏文笔自成一家，被誉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。发表著作上百余种，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。《胡适评传》与《蒋介石研究集》为其代表作。西方传媒更称其为「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评论家」。

李敖

胡适研究

HUSHI YANJIU

台湾／李敖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适研究/李敖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6. 7

ISBN 7-5057-2218-2

I. 胡... II. 李... III. 胡适 (1891~1962) —人
物研究 IV. K825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79624号

书名 胡适研究

作者 台湾 李敖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

规格 635×965毫米 16开本
22印张 282千字

版次 2006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06年8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5057-2218-2/C·3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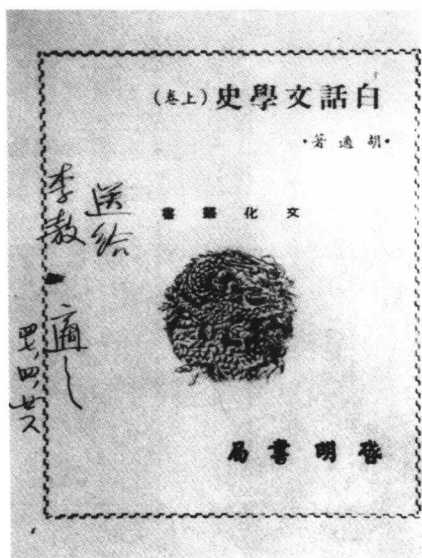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29.8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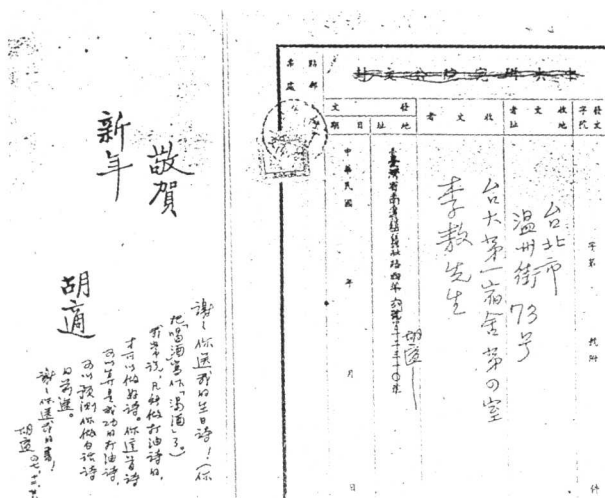
邮编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

日本名流欢宴胡适照片，胡适亲赠李敖。



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，胡适与李敖长谈于台北福州街 20 号，临别赠李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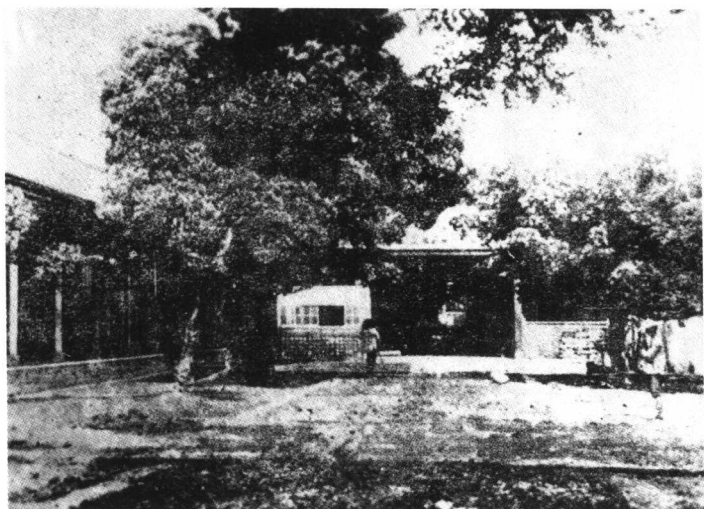
胡适给李敖的贺年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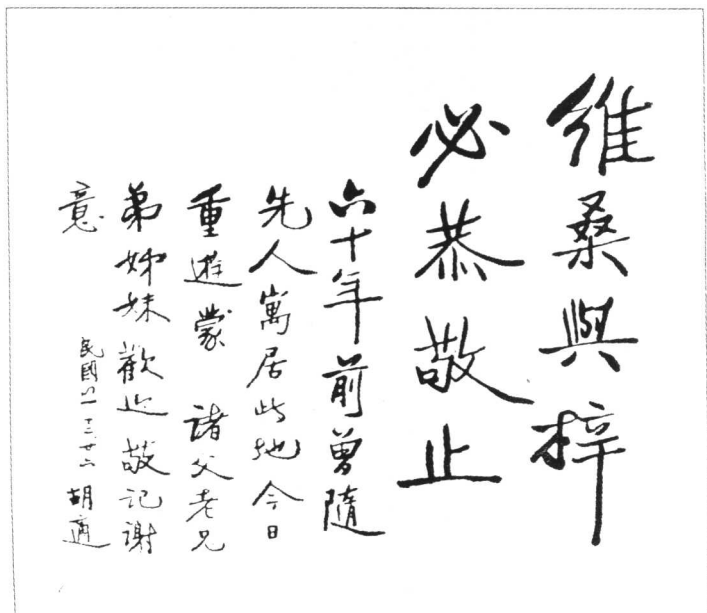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时代的胡适。



胡适十七岁时候主编的杂志（光绪三十四年，一九〇八），这是它在五十四年以后，第一次的“照相”（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藏）。



台南的胡适故居——清朝的台湾巡道署，现在的永福国民学校。



民国四十一年（一九五二），胡适访问台南旧地的题字。

李敖作品

胡适研究

目 录

胡适研究 /1

前记 /3

播种者胡适 /10

附录一 由文章谈到胡适(马五先生)/22

附录二 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(叶青)/23

附录三 小心求证《播种者胡适》的大胆假设(郑学稼)/33

附录四 我们应该赶过他(王洪钧)/39

为《播种者胡适》翻旧账 /42

附录一 再论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(叶青)
/72

附录二 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(郑学稼)/89

附录三 谈胡适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的信和文
(田尚明)/118

三人连环传 /125

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/137

附录 文章忌刻薄(刘星)/138

关于《胡适文存》/140

评介《丁文江的传记》/149

目 录

胡适评传 /161

关于《胡适评传》/163

楔子 /166

可怜的县太爷（一八四一——一八九五）/168

可怜的小寡妇（一八七三——一九一八）/187

半个台湾人（一八九一——一八九五）/195

——胡适也是“阿海”吗？

被拧肉的时代（一八九五——一九〇四）/215

“努力做徽骆驼”（一九〇四）/234

“侬跟我来”（一九〇四——一九〇六）/247

《竞业旬报》（一九〇六——一九〇八）/265

少年诗人（一九〇七——一九〇九）/300

“无忘城下盟”（一九〇八——一九〇九）/313

从逛窑子到上北京（一九〇九——一九一〇）/328

胡适研究

前 记

胡适先生死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。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点钟,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:

“别看他笑得那样好,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。”

在《播种者胡适》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。今天傍晚,这个“寂寞的人”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: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,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。在天路的历程中,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——他是一个战斗的人,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!

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。有一段说:

“我觉得你有点老惫,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,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,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。”

在我这封信前两天,他写信约我去南港“玩玩”;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,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,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。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,也没见到我去“玩玩”,他就倒下了!

两年十个月来,我一直没见到他,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——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,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!

这几段文字写好后,我并不打算发表,所以我改写了一篇《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》,发表在三月一日的《文星》杂志里。

※ ※ ※

胡适先生走进“地狱”后,眼看就快两年了。两年来,真可说是一个

既“冷漠”又“吵闹”的局面。

何以说“冷漠”呢？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。他们这批人，在胡适生前严然是他的畏友、良朋、门生、干女婿，是“蟠龙大花瓶”的赠送者，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，是“胡适合会”的“标会”者……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后，几乎在“尸骨未寒”的当儿，他们就变成了“不认得耶稣”的“彼得”。《新约》路加第二十二章里，有这样的故事：

他们拿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。彼得远远地跟着。

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，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

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说：“这个人素来也是同（耶稣）那人一伙的。”彼得却不承认，说：“女子！我不认得他！”

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说：“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”彼得说：“你这个人！我不是！”

约过了一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说：“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”彼得说：“你这个人！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！”

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（耶稣）转过身来看彼得。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——“今日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

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！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一千九百年，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——胡适的亲爱的“彼得”们，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，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：彼得还会羞惭痛哭，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，可是他们呢？他们都不会，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“告朔饩羊”，对遗照三鞠躬以后，一哄而散，坐车回家。

记得胡适死后不久，胡虚一先生在《民主潮》第十二卷六期（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）里，翻译了一篇《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》，他在译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：

这几年来，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，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做“花边新闻”的采访对象，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，一直是孤寂的！一直是忧愤的！为什么？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像得到的。近几年来，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，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“自由民主”的可悲人物！他的声誉，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“自由民主”糟蹋得不成样子了！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，在他们的谈话中，充分流露出他们“对胡适的失望”。虽然如此，可是“围剿胡适”之浪潮，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。而更可“悲”者是，“桃李满天下”的胡先生，他的门生高足，际此“围剿胡适”的风暴声中，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，除了一个不相干的“青年小子”李敖君挺身而出来说几句外，很少有人挺身而出为“胡适思想”做一是非辨的！你想：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？

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，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。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，在这两年里头，胡适的“门生高足”更是安静得可爱了，他们安静地看着，看着那个“不相干的‘青年小子’李敖君”来开创一个“吵闹”的局面。

※ ※ ※

所谓“吵闹”，应该从头说起。

一九六一年的年底，我应《文星》杂志编者的邀请，为他们写了一篇《播种者胡适》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，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，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，一个圈圈是“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”；一个圈圈是“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”，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；后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（任卓宣）先生和郑学稼先生，大家打做一团，十分热闹。

在《播种者胡适》发表以后，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，

例如香港《自由报》的社长雷啸岑先生（马五先生），《中国学生周报》中的若兰先生，《展望》杂志中的孟戈先生，台湾《作品》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，《民主中国》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，《文星》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、东方望先生、田尚明先生……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。此外在口头上面、书信方面，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。

当然相对的，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潮湃而来，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“三大‘评论’”：《政治评论》、《民主评论》和《世界评论》。在这些刊物上，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，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。对《播种者胡适》的问题，我只写过一篇《为〈播种者胡适〉翻旧账》的文字，来答复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，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，我一概不理。即使叶、郑两先生，我也只答复一次，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，我也懒得辩驳了。

我为什么不再答复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。我觉得对这两位先生，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，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。要了解他们必须从他们的“基本思路”（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）上一刀扎下，从“基本思路”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“心理运作”（mental operation）的过程。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后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“前期快感”（fore-pleasure）是什么主义以后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：“算了吧！放他们去吧！”

※ ※ ※

谈完了“冷漠”和“吵闹”两个局面以后，我觉得我该谈谈《播种者胡适》本人。我先抄《世界评论》第十年第五期（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六日）中，周伯达先生的《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》里的一段话：

《文星》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《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后校改》一文说：“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，一张便条，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：‘校改本，送给徐高阮、毛子水、

台静农、姚从吾、台大图书馆、成功大学图书馆、李敖、蒋孟邻、沈宗瀚、钱天鹤’。先生吩咐我：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后，请你照我最后的校本改正后，分送给他们。”据胡颂平先生说：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。从这件小事，我们可以看出：李敖这位年轻人，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，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，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，是先写李敖，而后写蒋孟邻的。关于这件小事，我只能做如下推断：其一、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；其二、是李敖所作的《播种者胡适》（本年一月一日）及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》（本年二月一日）这两篇文章，深为胡适所赏识。否则，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；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，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做得好才如此地看重他的。果真这样，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？我相信今后注重考据的人，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。

这段令人发笑的“推断”，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。其中有一点，所谓胡适“深为”“赏识”我这篇《播种者胡适》的问题，我觉得大可不必请“今后注意考据的人”来“考出这个秘密”了，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。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《文星》七十六期上，发表了一篇《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——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》，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《播种者胡适》的不高兴：

一天下午，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，商量一件公事。我很快地结束谈话，好让他静养。可是他止住我离开，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，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。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，我急忙设法推开，我说：“先生，我现在的范围很窄，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，我就懒得看它！”

“不，你应该看看这一期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，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划。“你看，这说的什么，这样的轻佻浮薄！再看这儿，简直瞎闹。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！”他一面指给我，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划出来。情绪已是颇不开心。

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“李敖这位年轻人”的“深为”“赏识”罢？

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，胡适先生死后，他整理遗稿，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《播种者胡适》后写给我的信，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“妥为保管（封锁？）”了，所以直到今天，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。

我知道我这篇《播种者胡适》会三面不讨好：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，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，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，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，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，不计其他。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，他的所作所为、他的真面目，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，这种影响，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账。基于这个理由，我除了写一部《胡适评传》外，决定再印行这本《胡适研究》。

※ ※ ※

这本《胡适研究》，共收了我自己七篇^①文字：第一篇就是《播种者胡适》，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，一篇“祸首”。

第二篇是《为〈播种者胡适〉翻旧账》，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，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，正是胡适“遽归道山”的日子，胡适生不及见，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。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，可是限于篇幅，我只能挑出八篇，作为附录。

第三篇《三人连环传》，是写梁启超、胡适、徐志摩三个人的。这种连环写法，也许可以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。

第四篇就是《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》。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，最为某些人所欣赏，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划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，真是一件奇妙的事。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。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，在报上痛骂我，我只好把这种批评，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后，作为附录。